



浩然删改《金光大道》之原因新探

王大威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浩然在《金光大道》一、二部再版时所做的删改,为深入研究浩然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浩然删改《金光大道》的原因既有其对文学性因素的考量,也有其自身心态、创作水准的改变,更有删改时间、编辑等多种外部文艺生产机制等制约因素。应将浩然对《金光大道》的删改置于更加宏阔复杂的文学史视野中进行多维度考察,避免预设观念的误区,以图接近浩然删改的本意。同时,应充分重视实证研究在摆脱当代文学研究“轻考证”的浮躁之风,以及拓宽当代文学研究路径中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浩然;《金光大道》;再版本;删改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3)04-0051-06

作为创作时距横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的作家,浩然的每一个创作阶段都是当代文学转型的见证,其对当代文学的价值不言而喻。以《金光大道》一、二部再版所引发的争议为例,浩然对小说文本进行了大量修改,但他似乎有意无意地“隐瞒”了这一事实,其真实意图究竟为何,就很值得关注。于树军曾将1994年京华出版社出版的《金光大道》一、二部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二部进行细致的对比,发现浩然对原版中大量政治宣教描写作了删改,这与浩然宣称未曾删改的说法不一致。于树军认为,浩然“隐瞒”在《金光大道》再版时进行过删改,目的在于淡化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扭转自己在“文革”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为《金光大道》谋求生存权,也是其焦虑、反省以及重塑自我的体现。与于树军的观点不同,邵部则认为浩然对《金光大道》的删改集中于超出20世纪50年代语境的部分,这不是为了迎合八九十年代的新时期观念,反倒“是要把它重新放回到‘十七年’”^{[1]21}。二者在论述浩然删改意图时皆有道理,却又相互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浩然在《金光大道》再版时所做的删改为深入研究作家本人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途径。这就需要立足整体删改,依据多重史料,从文学内部与外部双重角度加以考察,以期接近浩然更

加真实的删改意图。

一、焦虑、反省与重塑自我

《金光大道》是浩然“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作品,三、四部因政治原因未能及时出版。尽管浩然相信“它应当‘活’下去,能够活下去”^{[2]160},但直至1994年8月京华出版社推出《金光大道》一至四部完整版,这部作品的后两部才得以面世。这部作品的完整出版,加之作者浩然《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使得浩然及其作品在“文革”结束后再次引发热议。不过,当时评论者均未注意到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所做的删改。学者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与再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已经在20多年之后了。

实际上,早在京华出版社推出《金光大道》完整版之前,浩然就对这部作品已经出版的一、二部进行过几次修改。据其子梁秋川记述:“1978年3月29日,父亲将两本《金光大道》第一部撕开,一张张地贴在白纸上,从4月4日起开始了对旧作的修订。”^{[2]186}“4月17日,父亲将已出版的《金光大道》全部修订完成。”^{[2]187}1994年《金光大道》完整版出版之前,浩然又对其进行了润色。《浩然文艺绿化志》记载:“1994年6月开始,浩然在‘泥土巢’重新

收稿日期:2023-03-02

基金项目: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浩然中短篇小说研究”(KYCX22_273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70年文学语言观念研究”(22AZW015);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叙事构建视阈中的新时代江苏小说研究”(21ZWA001)

作者简介:王大威,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整理《金光大道》一至四部,对主要情节未作任何修改,使其保留原汁原味原貌,真实地再现 50 年代中国农村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画面。”^{[3]11}可见,《金光大道》的一、二两部先后在 1972 年和 1974 年出版之后,又经浩然之手修订了两次。然而,浩然在 1994 年版《金光大道》的前言《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中却写道:“我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4]序4}在《浩然口述自传》中,浩然再次提到京华本《金光大道》:“但历史就是历史,已经这样了,我不会去改动它。”^{[5]239}

浩然的说法与做法显然不一致,原因何在?于树军通过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再版本与初版本的比较研究,发现再版本对初版本进行了大量删改:“笔者对浩然于再版本中所做的重要删改(标点、错别字修改除外)统计大致如下:删节 442 处以上,修改至少 307 处,增添不少于 148 处,粗略计算删改及增补达数万字之多。”^{[6]126}于树军认为,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的删改是其焦虑、反省与重塑自我的体现,目的在于淡化初版本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拯救他最爱的这部作品。

然而,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毕竟只是分析维度之一,尽管浩然删减了初版本中大量原有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当鲜明的词句,但是否因此使得这部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许多”,似可商榷。“许多”非常含糊,也许上万字的删改不可谓不多,但相对于 190 万字的《金光大道》来说也可谓“不多”。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金光大道》并不缺乏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教。也正是因此,删改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金光大道》说教色彩浓厚的特征,大量意识形态表述仍在。连晓霞对《金光大道》中常用的政治意识形态词语及其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如“剥削,87;党员,632;互助组,813;资本主义,39”^{[7]284-286}等。除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词语外,《金光大道》中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表述也十分常见,尤其是第一部《高歌猛进》一章,这种宣教意味相当明显。第二部也是如此。在第五章《双管齐下》中,“田雨说:‘县委会上,梁书记号召我们在工作中抓住发动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个中心,我们应当在一言一行里把这个中心突出起来。’”^{[8]47}等,不一而足。

除了大量未删改部分所带有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述,《金光大道》一、二部再版本中还存在删改之后意识形态色彩没有变淡反而加重的表述。例如在第一部第六章《珍贵的启示》中,浩然将“经过两天的反复思索,这种怀疑越发加重了”^{[9]103}改为“不论在打仗那会儿,还是在土改那会儿,上级下来

工作的人员都说:‘等共产党坐稳江山之后,要学苏联的样子,搞社会主义,在农村成立集体农庄。’如今怎么闹起了‘发家竞赛’呢?”^{[4]93}这样的删改不但没有减轻政治说教意味,反而“变本加厉”。当然,“加重”的情况仍属少数,较多的依然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删改及不作意识形态处理的删改,如对文本的润色等。

文学作品的删改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加工”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从意识形态的视角观察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所作的删改,要洞悉浩然真实的删改意图,那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对浩然删改《金光大道》时的具体情境进行细致考察,依据更加翔实的史料作出判断。毕竟,“与文献史料‘不及物’的研究及其空疏的学风,它本身是有问题的”^{[10]总序1}。因此,考察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所作删改的真实用意,除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这一视角外,还需要从史料入手,着眼于文学创作自身审美因素与外部因素。自身审美因素涉及作品内在肌理,外部因素则包含作者自身状况以及文艺生产机制等。

二、立足文学性本位的删改

通过细致比对,结合相关史料考察,可以发现浩然在《金光大道》一、二部再版时所做的修订,主要还是基于增强作品文学性的考量,是从文学性本位出发的。

首先,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文字的删改,正如其子梁秋川所说是一种“润色”。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光大道》第一部正文第一页第二段中的“黑夜,没头没脑的黑夜,好像把一切都扣在锅底下了”^{[9]1}被修改为“黑夜,没头没脑的黑夜,好像把人世间的一切都扣在锅底下了”^{[4]1},”一切”前面加上了“人世间的”,艺术效果有所增强。第三段中的“火珠”前添加了修饰词“微弱的”;第四段中的“男人”前加入修饰词“受着病魔摧残的”;第五段中的“女人”前加入修饰词“满脸愁苦的”;第六段中的“你们先去”被改为“你们先走一步”;第七段中的“这夫妻俩一边商量,一边哭,反反复复地折腾了一夜,才把逃荒的事情定下来。他们听别人说,一个表侄女婿在河北混得不错,想投奔他那儿去,闯一闯活下去的道路”^{[9]1},在“商量”后面加上了“生存的出路”,将“一边哭”改为“一边叹息和哭啼”,“表侄女婿”前面加上了“搬到河北的”,“闯一闯活下去的道路”改成“试一试运气”。不难看出,修改之后的文本内容更加充实,语言更加生动形象,表意更加

简练明快。此外,在第一部第一章《新生的芳草地》第六段中,浩然将“黑粗布的小棉袄却有一半纽扣没有系”^{[9]53}的“棉袄”与“却”之间用逗号隔开,“紫红色的胸脯子露在外边”^{[9]53}改为“露出一片紫红色的胸脯子”^{[4]47};第七段中的“好往上边汇报”^{[9]54}改为“好给区里的同志做汇报”^{[4]48};在第二章第一段最后一句之前加上了“他们还垒了一个猪圈,搭了个柴禾棚子,编了个小排子门儿”^{[4]54},并将此段最后一句中“这里”改成“这所宅院”。在第二部第一章的开头,浩然添加了“常言说:三秋不如一麦忙”^{[11]1}这富有乡土气息的一笔。在第二段中,他又在“麦收”和“象”之间插入了“倒挺容易”的短语。在第二部第八章第一段将“中午”改为“晌午”,一字之差,却更符合农民群众的口吻。第二段中的“他们就跑到地里,等一阵子,还是不见高大泉;大伙干了一阵活儿,开始在地头上歇着了,高大泉依旧没有露面”^{[8]77}被改为“他和几个组员先后脚地来到地里,叨叨咕咕地等一阵子,就开始干活儿。可是依旧不见高大泉的踪影”^{[11]68}。此番改动,表意变得更为流畅,原来口头语的随意性也得以收敛。类似的“润色”还有很多,小说的艺术性也因此增色不少。除此之外,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的删改,其删去的除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说教,还有大量直白的与宣教无关的描述,包括人物对话中的语气词,因而使小说文本更加精练。尽管删除部分宣教的占比较大,但不论宣教与否,删的部分多是不利于推动情节发展的文字,这使得《金光大道》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部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而存在。《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中有很多不适合小说体裁的叙述、议论和抒情,再版时被浩然有意删掉了,改为借助人物的心理活动或者言说活动予以呈现。在《引子》的最后部分,浩然难抑激动而代替主人公说话的部分,就在再版时被删掉了。

其次,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的修改,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遵从其内心文学性的召唤,并受到文学前辈叶圣陶的影响。浩然的早期创作常常体现出重视思想教育、感染力、情节,尤其是注重人物精神活动的特征。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给杨啸的信中,就曾指出杨啸作品的思想内容不够突出,即在杨啸的作品中看不出“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里人物形象的塑造,企图告诉读者什么?”^{[12]38}他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的删改,体现出了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知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叶圣陶初读《艳阳天》时就已委婉提出过相关意见。叶圣陶发觉

“作者说明人物性习与心理状态之处,似稍嫌其多”^{[12]102}。在给叶至善的信中,叶圣陶认为“高大泉在书中,长篇说白多,有些空议论,有些重复”^{[13]529}。《金光大道》第一部出征求意见本时,叶圣陶甚至提出愿为浩然看校样。1972年2月8日,叶老致信浩然:“我偏爱您的作品,极盼早日阅读。我很想讨个差使,我为您看校样。我自信我的校对工作能力是不错的。您如果要我看,我必认真校对,从速逐批交还,不误印刷厂的进程。如是,我的早日阅读的愿望达到了,这是最大的欢慰。”^{[14]323}1972年2月23日,叶老再次致信浩然,谈及他校对《金光大道》的情况:“您叫我尽量提意见。我不客气,提的意见不算少,不过全是枝枝节节的细小问题,有些是我南方人不习惯不了解您所用的北方话。不管错不错,我都记在书页旁边,候您考虑。”^{[14]324}同年3月1日,叶老致叶至善的信中再次披露校订细节:“我看浩然的书看了16天,昨天下午看完,稍感疲累。今天上午,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书上也批得很多,大部分的页面都不甚干净。他要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要变动,很局促了。”^{[13]431}3月1日是当年正月十六,根据叶老看16天推算,他校勘的时间为1971年除夕(农历十二月三十,公历2月14日)至1972年元宵下午(农历正月十五,公历2月29日)。叶老在2月15日致叶至善的信中披露浩然“是前晚来的”^{[13]420},即2月13日。在2月27日致浩然的信中表示3月1日浩然可取校勘本,自己则一定会在2月底校勘完毕。这也印证了梁秋川的记载:“这一年的春节叶圣陶都没有过安生,闭门谢客,批阅《金光大道》第一部征求意见本。”^{[12]104}只不过由于当时的军代表不懂文学等原因,叶圣陶修改《金光大道》的努力被轻易否定了。根据删改情况,结合书信资料来看,再版本《金光大道》的删改有可能参照了叶圣陶所提的建议,尤其是浩然自叙一直珍藏着叶圣陶先生的修改本^①,并且他本人对叶老非常尊敬。特别是人物描写、议论说教等删改,更是印证了叶圣陶所提的建议。尽管这种推断没有确切的史料依据,但还是可以大胆推测再版本《金光大道》的修订受到了叶圣陶校勘本的影响。

综上,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的删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试图使这部作品更具艺术价值。尽管浩然《金光大道》一、二部创作、出版于特殊年代,再版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对其作品所作的删改难免被研究者赋予复杂的意涵,但

归根结底他仍然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立足文学性本位完成了修改。

三、作家心态、文学机制与作品再版

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所作的修改,除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外,还与他当时整理旧作时的心态、文学作品的再版机制等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末,浩然时常感到痛苦,希望振作起来。除了应对接连不断的批评与检讨,为消磨时间、总结经验,浩然开始整理旧作。他第一次整理《金光大道》便是在这一时期。望着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作品,浩然不由感慨:“青春,一去不复返了!”^{[2]187}也是在这一时期,浩然前往京郊通县安家,从此开始了“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的生活,希望能“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浩然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整旗鼓。他在1980年11月29日致胡世宗的信中表露了再度奋发的决心:“过了年,虚岁五十了,哪有权利不珍视分分秒秒呢?……为此,一九八一年我想‘大干一场!’”^{[15]376}1984年10月16日,张和平安排浩然参加赴日本访问的文化代表团,被浩然拒绝。浩然于当日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字:“我舍不得花时间。人各有志。我的志在于趁没老化,写几本自己满意的书。”^{[12]297}他总是试图抓紧时间,做出成绩。他在1989年1月22日致胡世宗的信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北京有好几个重要和不重要的活动都拉我‘必须’参加,为之很苦恼……开春再挣扎一下试试。但愿能是个胜利者,别败下来。”^{[15]422}尽管浩然面对人生逆境没有沉沦,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但他自认为效果不甚理想。长篇小说《苍生》是浩然回归文坛的代表作,虽得到一些好评却因为某些原因未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这在某种程度上泯灭了其通过创作重新获得认可的想法。于是,浩然将自己晚年的生命付诸“文艺绿化工程”,旨在农村培养作家,为文艺事业做贡献。浩然试图用这种方式作一次抗争,不惜将自己宝贵的写作时间全部用于“文艺绿化工程”。然而,在农村这块土地上想培养出赵树理那样的作家,短时间内希望何其渺茫,这客观上加剧了浩然的苦闷。

除了文艺事业不顺令浩然非常糟心,家庭琐事、个人健康状况等也令他十分头疼。1993年浩然的老伴生病之后,脾气喜怒无常,“稍不如意,还脱下她的鞋子朝我(浩然)狠狠地甩过来”^{[16]192}。晚年的浩然面对衰老深感焦虑,更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做一些有益于文学的事。1992年浩然在致陈利争的信

中写道:“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法则。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3]84}直到生了场大病,浩然“心有余,力不足”之感愈发沉重,年轻时激昂乐观的情绪消磨殆尽,这种心境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修订《金光大道》产生影响。沉重的心情加之新时期激进气息的退却,或许是浩然将《金光大道》中很多人物对话末尾语气词删去的原因。

“文革”前几年,浩然是在被批斗、下放中度过。据其子梁秋川记载,1967年至1970年,除1967年发表一篇散论、1968年与李学鳌合作发表特写《闻风而动的人们》和起草《金光大道》第一部《春播》第一稿外,浩然几乎完全停下了笔。直至1970年8月23日、24日,浩然才陆续收到《北京日报》与《光明日报》的约稿信。浩然在致杨啸的信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写作状态:“因为他们的鼓励,我开始考虑能否写一篇东西。脑袋果真生锈了,勉强草了个架子,实在不像个样。看来尽管加紧磨练,这把刀也不会很锋利了,起码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胜任。”^②不久之后开始创作的《金光大道》,就是浩然加紧“磨练”的结果。不难想见,尽管这几年“深入生活”为浩然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材料,但长期停笔也对他的文学书写造成了障碍。到整理修改《金光大道》的时候,浩然的文学“功力”不仅有所恢复,而且有了大幅提升,其《金光大道》再版时文学性得以增强盖源于此。

浩然出版《金光大道》完整版选择了京华出版社,而此时京华出版社只有一年多的“社龄”^③。要再版和完整出版一部在“文革”期间面世且颇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对于刚刚成立一年多的京华出版社可说是一次“冒险”。1994年6月15日,浩然于泥土巢草成《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之后便准备前往美国访问。那么,在浩然急就序言后,为了稳妥起见,是否存在京华出版社与其商量参与修订的情况?因浩然草序在先、出版社修订在后,致使浩然“言行不一”,在序中“隐瞒”了修改。此外,对于再版《金光大道》这样一部有争议的作品,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势必谨慎行事,对作品进行一定的修改是顺理成章的。浩然对于来自编辑部和出版社的合理修改意见和建议也是乐于接受的。梁秋川说:“父亲对编辑修改他的文章并不反感,有些还认为改得很好……对于这样的改动,父亲不仅认为改得水平很高,是认可的,而且对编辑心存感激。”^{[12]337}可见,假若编辑对《金光大道》进行一定的删改,浩然也会认可。由此,还应考虑“文革”时期文学作品特殊的编

辑出版机制,如军代表等对《金光大道》的意见和建议,也许作品中出现的很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文字并非全为浩然所写,京华出版社再版本或许才是他本人创作意愿的体现。

四、“前理解”对再版本的误读

浩然在《金光大道》一、二部再版时所做的删改,之所以呈现出现在的样貌,是因为其立足文学性本位、特殊时期的心态和文学作品的出版、再版机制等因素共同促成的。过度关注某一方面的因素,很可能会偏离作者删改作品的原意。这也是我们试图对研究者将浩然删改《金光大道》主要归结为淡化意识形态的说法提出商榷的原因。或许,研究者将浩然对《金光大道》的删改视作其淡化作品意识形态色彩的努力,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新启蒙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将“文革”看作前现代抑或封建时期,而将新时期看作现代时期。从这一视角看问题,自然会得出浩然之所以删改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说教,并且对这种删改加以“隐瞒”,就是为了适应新时期文学创作潮流以换取《金光大道》的生存权,而忽视了浩然删改作品时的文学性本位。在论证这一观点的时候,研究者就会偏向寻找印证自己观念的材料,或者将材料与观念嫁接,甚至用观念带动材料。这就更需要依据更多史料,将浩然对《金光大道》的删改置于更加宏阔复杂的文学史视野中,在多维度考察中接近浩然删改作品的本意。

如何看待浩然在京华版《金光大道》前言中对删改情况的“隐瞒”,关乎作家的人品,很有讨论的必要。《金光大道》是浩然在特殊年代、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仓促成稿的,对其加以修改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浩然在1971年10月6日致杨啸的信中写道:“《金光大道》本是我计划奋斗终身的‘大题材’。正如你一再嘱咐的,要从容地写,我打算写到死,或写到自己满意为止。因为组织上和社会上的要求急迫,加上《王国福》人工流产,使它不能不在仓促和要迁就许多问题的情况下上马。这样粗糙其次,主要是不能窥视全貌,很难为人理解它。它要遭到的处境,使我不好猜度,也很沉痛。”^②《金光大道》作为浩然的代表作,自然值得倾注大量心血一改再改。至于修改的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价。同时,浩然当时本就处于风口浪尖,仅是再版就已经惹来不小争议,倘使承认再版本的删改可能会闹得满城风雨。个中辛酸,恐外人难以体味。实际上,浩然关于《金光大道》再版本的“原汁原味说”也并无不妥。比如,在对历史事件(如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

阶级斗争等)的看法上,再版本确实做到了“原汁原味”。浩然未曾以新时期的新观念改写作品,也未曾用新时期的政治观念改写情节和人物性格。浩然所说的未作修改,并不能理解为在文字表述上丝毫未作删改。就大多数作家而言,对早期发表于期刊上的作品出单行本时加以修改是常事。艺术加工的需要、历史局限性的改变等因素都会促成作者对作品的修改。例如,诗人刘章“文革”时期的名篇《牧羊曲·牧场上》新时期再版时即存在与浩然再版《金光大道》类似的删改。刘章的这首诗草于1967年夏,改于1971年冬,分别收录在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出版的诗集《映山红》和1991年11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章诗选》中。在花山文艺版中,刘章删去了“脚踩云,/背倚天,/手捧宝书松下读,/清风帮着把页掀。//一字字,/入眼帘,/春风清爽心开朗,/革命真理似甘泉。//老经验,/新体会,/升为理性勤检验,/不断丰富写成篇”^{[17]38-39}以及“味正浓,/情正酣,/羊儿吃得圆鼓鼓,/红日悬正南!//”^{[17]40}同时,刘章在再版本中将“隔山听召唤”^{[17]40}一句中的“召唤”改为了“呼唤”。在另一首《牧羊曲·出山》中,刘章将“无限风光在险峰!”^{[18]41}改为“锦绣风光一望中”^{[19]53}。再版本还将“歌一阵,/吼几声,/锦绣风光心不迷,/提防豺狼来逞凶!//”^{[19]41-42}删去。不难看出,刘章在新时期再版诗集时对“文革”时期旧作中的意识形态表述做了处理。类似浩然、刘章在新时期再版作品时对原版中不合新时期语境的文字进行了某些删改,在文学界可以说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不能据此推定,作家“文革”时期的书写是违心,新时期的删改是投机,因为处在“文革”时期作家所使用意识形态语句并无任何不妥。同时,这不仅是作者的写作常态,还是发表的惯例,同时也是读者的阅读要求。正如刘章在诗选后记中的阐述:“我的诗未发表前反复改,结集时改,这次编选集又作了许多修饰或删节,这样犹嫌欠火候。例如《牧羊曲》中的《牧场上》,本意是写牧场风光之美,可是当时不贴个标签便不得问世,现在才是它的‘庐山真面目’。其他有些篇章也是如此,不一一列述。因为文学作品是属于社会的,作者要对社会负责,尽可能使之完美。”^{[20]335}对于浩然而言,他始终最爱《金光大道》,从来不曾因写作了《金光大道》感到后悔。研究者将浩然对《金光大道》的删改纳入新时期的语境考察时,必须注意浩然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带有的强烈隔膜感。正如他在致胡世宗的信中所说:“如今的社会,看不清,难写,也没兴趣写。”^{[15]433}同时,探讨浩然删改《金光大道》的

意图还应避免对“文革”时期文学作品鄙夷的前理解,先验地认为《金光大道》是“御用文学”,是浩然迎合当权者的违心之作。其实,正是对“文革”时期文学作品鄙夷的前理解,制约了对“文革”时期文学作品价值的发掘。

五、结语

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所作的删改,并非全然为了淡化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是文学性本位、自身心态、创作水准改变以及外部文艺生产机制制约等因素共同促成的。就大多数作家而言,对自己“文革”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新时期再版时进行删改是一种常态,无须讳言更不必刻意“隐瞒”。因此,应将浩然对于《金光大道》的删改问题置于更加宏阔复杂的文学史视野中,避免预设观念的误区,通过多维度考察接近浩然删改作品的本意。值得注意的是,于树军有关《金光大道》版本考论的观点已经提出多年,有了重新探讨的空间。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一个学科的入门仪式通常是由对开创者的批评开始的。版本研究是实证研究的类型之一,相较于摇曳多姿的理论研究,版本研究似乎显得过分朴素甚至笨拙。然而,学术研究应从实证入手,实证研究才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性问题。通过对文学作品版本变动的考证,或许可以窥探当代文学运行机制、作家心理变动与当代文学的某种观念的衍变,这是拓宽当代文学研究路径的有益尝试,也是积极建构本土话语、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一种方式。本文意在以对《金光大道》再版删改问题的讨论,唤起未来研究者对以版本考证为代表的实证研究的关注。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摆脱浮躁、走向规范和成熟的路径。

注释:

- ①笔者曾就浩然珍藏叶圣陶校勘本《金光大道》一事询问过其子梁秋川先生,梁先生表示该校勘本他本人也未见过。梁先生告知笔者,据其姐姐说,浩然在世时曾让三河文联从通县拉走大量资料,不知其中有没有叶老校勘过的《金光大道》稿本。
- ②分别是浩然1970年8月29日和1971年10月6日致杨啸的信,引自梁春水、梁秋川编《浩然书信集》,未刊本。杨啸,浩然好友,著名作家,著有小说《红雨》等。未刊书信均由浩然三子梁秋川先生提供,在此深表谢意!
- ③尽管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刘国玺最先与浩然商议由百花

社出版四部完整版《金光大道》,但最终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对此,刘国玺曾撰文加以说明。详见刘国玺《〈金光大道〉当谁出》,《春秋集》第70-75页。

参考文献:

- [1]邵部.短二十世纪的延长线上:《金光大道》出版考论[J].文艺争鸣,2021(2):15-21.
- [2]梁秋川.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
- [3]金城,王宝森.浩然文艺绿化志[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
- [4]浩然.金光大道:第1部[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4.
- [5]浩然.浩然口述自传[M].郑实,采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6]于树军.浩然的文学史焦虑与自我反省及重塑:以《金光大道》再版本的修改为例[J].学术月刊,2016(4):125-133,113.
- [7]连晓霞.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话语:《金光大道》话语分析[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
- [8]浩然.金光大道:第2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 [9]浩然.金光大道:第1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 [10]吴秀明,郭剑敏.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文学期刊、社团与流派史料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 [11]浩然.金光大道:第2部[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4.
- [12]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
- [13]叶小沫,叶永和,叶圣陶叶至善于校家书(1969—197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4]浩然.怀念叶圣陶[M]//泥土巢写作散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 [15]胡世宗.我与浩然[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
- [16]马进,秦晓鸣.夏访浩然[M]//政协山东省昌乐县委员会.浩然与昌乐.北京:长征出版社,1999.
- [17]刘章.牧羊曲·牧场上[M]//映山红.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
- [18]刘章.牧羊曲·出山[M]//映山红.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
- [19]刘章.牧羊曲·出山[M]//刘章诗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 [20]刘章.后记[M]//刘章诗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于湘]